



□ 陈洪宜

人们都在说“开放”，而它的要义应是“能开能放，双开双放”，这样的社会才有活力。拿这一标尺来衡量中国史，那么，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双开双放、兼容并包、互利共赢的。这一开放基因，历久弥坚，经久弥强，在它面前，任何形式的打击都会转化为对它的淬砺。

明码标价以吸引顾客；要凭契约合同保证商业信用，处理交易诉讼；要聘请行业能手鉴别伪劣商品，消除欺诈；要用刑律约束市场暴力、打击偷盗贪占吞并活动。规定中还特设“泉府”一职，运用国家资金平购平销，调剂市场余缺。凡是赊购货物的，还款有法定期限；凡民众向泉府批发货物或借贷本金做买卖的，按国家税率收取利息；凡政府事务所需的财物，

人则大力引进西域瓜果蔬菜，中亚、西亚各地的雄狮、琉璃瓦、胡琴、苜蓿、葡萄、芝麻、菠菜等，都来到了中土，使中华大地发生了生态景观的“大换装”；正是从汉代起，波斯的雄狮、天竺的凤凰（孔雀）都在中国土地上安家落户，共同营造和谐吉祥。

第二次波峰出现在六朝之际。随着“五胡”的内迁与天竺佛教文化的引进，致使汉化与胡化相向而行；少

城、广府、刺桐，名震天下，且形成了番商聚居区。阿拉伯文化东传，天文、医学、数学之经典得以在中国出版流布。玉米、花生、棉花、甘薯、烟草、占城稻等农作物入华，引发中华大地生态景观的第二次“大换装”，满足了此后倍增的中国人口的衣食之需，支持了巨额的对外贸易。

第五次波峰出现在明清。其突出标志是郑和下西洋、“天学”入华以



□ 王兆贵

韩休让我睡得踏实

唐玄宗：

常言道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其中的道理人人都懂，身体力行起来却不那么容易。翻检一下古代那些从谏如流的故事就会发现，这样的记载很多，但对来自部下的批评，能像流水那样毫无抵触者并不多见。判断的依据，主要看他能否将逆耳之言视为对自己的忠告和爱护，并将之上升到事业兴衰的高度，从而化为自觉行动。

唐玄宗年间，虢州刺史韩休耿正率直，一向不趋炎附势。虢州位于长安与洛阳之间，是皇上移驾东都的必经之地。玄宗往返比较频繁，且每次路过这里，大队人马所需草料等，均由当地官吏向百姓征收摊派。虢州民众不堪其扰，怨声载道。韩休上任后，为此事专条上书请求减免。时任宰相以为草料事小，予以驳回。事实上，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到百姓生计，许多人要耗资或变卖家产到外地买草料应付御差，穷苦人家负担不起，只好卖儿鬻女筹资。韩休于心不忍，再次上表，陈情说，这样长期下去，百姓被逼无奈，保不准会群起反抗。属下劝他说，这样做会得罪宰相。韩休说，作为地方官，不能为百姓减轻负担，何以为政？若因此而获罪，我心甘情愿。于是再次上书宰相。宰相见韩休说得这么严重，就把奏折呈给了皇上。玄宗感到这的确不是小事，遂下令免除虢州百姓的这项额外负担。玄宗听宰相说这是韩休的第二道奏折了，就感慨说：难得韩休体恤民情，一再吁请，这样的官员多一个，百姓就少一分灾难，也让我多一分清醒。

后来韩休拜相，万年县尉李美玉获罪，皇上勒令将其流放岭南。韩休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谏阻说：李美玉不过是个小官，所犯亦非大罪。如今朝廷有大奸尚且未受惩处，怎能不分轻重缓急舍大而取小呢？金吾大将军程伯献，恃恩骄纵，贪财牟利，超标建住宅、配车马。臣请先把大奸拿下，再抓小害也不迟。唐玄宗没同意。韩休较劲说，轻罪尚不能宽宥，重罪却放过不问，陛下若不惩处程伯献，臣便不会流放李美玉。玄宗见韩休说得在理，只好同意。

韩休眼里揉不得沙子，事无巨细，直言敢谏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玄宗喜好狩猎、宴乐、歌舞，每当铺张过甚，便问左右侍从说，韩休知否？语音刚落，韩休谏疏就已送达，这令玄宗有些闷闷不乐。

侍从说，自从韩休拜相，陛下忧多乐少，为何不赶他走呢？玄宗说，我虽然瘦了，但天下却肥了，萧嵩每次奏议都顺着我，我退朝后常睡不安稳；韩休劝谏虽多，我退朝之后反而睡得安稳。我用韩休为相，是为国家社稷考虑。

唐玄宗提到的萧嵩，时任中书令，韩休还是他举荐的。开元二十一年（公元733年），侍中裴光庭病逝。玄宗让萧嵩举荐接替人选。萧嵩以为韩休为人平和，易于控制，便推举了韩休。谁知韩休主政后刚直不阿，每每与萧嵩意见相左，甚至闹得很不愉快。老臣宋璟叹曰，没想到韩休竟能如此，真乃仁者之勇啊！

正因有韩休这样的宰辅劝谏“不休”，盛唐余辉才得以延续，待到宋璟、张九龄、韩休等一千直臣相继归休离世，开元盛世也就终结了。有诗为证：“阖闾千门万户开，三郎沉醉打球回。九龄已老韩休死，无复明朝谏疏来。”宋人晁说之的这番感慨，道尽了权力失去监督后的衰败征兆。由此让我联想到“赵简子泣周舍”的历史典故。赵简子在诤臣周舍去世三年后的一次酒会上，酒酣耳热之际，竟当众哭了起来。诸大夫以为自己有罪而不知，起身打算离开，赵简子把他们叫回来，解释说：“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：‘百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’。众人之唯唯，不如周舍之谏谏。昔紂昏昏而亡，武王谔谔而昌。自周舍之死，吾未尝闻吾过也。故人君不闻其非，及闻而不改者亡，吾国其几于亡矣，是以泣也。”小问题没人提醒，大问题无人批评，以致酿成大错，正所谓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”啊！

人物志



泉州的印度教石柱遗迹

中国先民有序交易

我们都是炎黄子孙。老祖炎帝神农氏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日中为市，交易而退”。他是两手抓，把农田作息与物物交易同时作为氏族的基本生活秩序来调理的。老祖黄帝轩辕氏，为便捷地推进人员、物资的流通，创制了最好的承载工具舟车；其时的“披山通道”，显然考虑到了远距离通商；而所创制的甲骨文字，更为信息的跨时空交流提供了“惊天地、泣鬼神”的决定性手段。夏禹治水，疏通九州河道，为之规划水陆交通联线，统计各州人口、物资，尤其是土特产，这就为九州的内生性市场与外向型市场勾画了蓝图。殷商部族以善于“远距离经商”起家。他们能组织牛马、人员、物资进行跨越黄河的长途大迁徙；他们懂得用贝壳作为交易之等价媒介，走出了“物物交换”的原始模式，不愧被称之为“商”。这一切，正是中华文明开放基因的有效表达。

周初有“洪范八政”之说，把“食货”定义为国家机器的八大职能之首。其中，“货”，专指投放市场、用于交换的商品，这标志着先民商品意识的觉醒。周代形成了严密的市场管理机制，特别是实施了契约管理，凭“质剂”进行公平有效的交易；并开始关注市场资金的流通。《周礼》要求：坊市主管人（市令）要负责对商品作分类管理，依序配置，平衡市价；要负责依法禁止高级奢侈品与违禁品上市；要负责均衡市场供求，招引行商坐贾投入丰富的商品，确保市场有足够的商品流通；按照质量标准检测商品，取缔不合格的行滥货，并

可向泉府出据领取；每年年末，总计全年的支出和收入，将结余上交。看来，在中国，商品贸易从来就不是私人的“自由”行为，而处于政府权力的有效覆盖之下。这样严密的管理条文，出现在距今30个世纪以前，表明当时的商品交易已经惊人地发达了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国之间的人员、物资、信息交流，展现了“国际交往”的形态，全国各地内生性市场与外向型市场互渗共存，故对内对外，都要打开市场，使人员、资金和信息充分流动。于是出现了一批国际商人，可与各国君王分庭抗礼，出现了一批工商业都会，出现了一批农工副业上的名匠。

中外文化大交流的五大波峰

中华文化历来是开放而兼容的，它一直吸纳着异质文明的因子来充实自己，非常善于融铸异质文明成果，在保存自己民族主体性的前提下，完成文化形态的结构性、体制性的根本改观，又反馈于世界。中华文明与南亚、中亚、西亚的古文明一起，照亮了大半个世界。历史上，中外之间一直有着持续不断的交汇与互动，是文化的正态大交流，曾先后形成五大波峰。

第一次波峰出现在两汉之际，标志是丝绸之路。汉代的农耕、水利、蚕桑、建筑等直接关系到芸芸众生衣食住行的基础产业，以及医药、天文、数学等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性学科，都走在世界的前列，都越过葱岭向波斯、阿拉伯地区传去；中国丝绸的西传，促进了中亚、西亚、南欧、北非人生活质量的提升。中原

数民族接受中原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礼仪文化、法纪规范；扬弃落后习俗，提升自身的文明素质，学汉语、用汉姓、起汉名，实现了汉化；汉族人则从起居坐卧入手仿照胡人，进而学习其音乐、舞蹈、雕塑、绘画；进而又接受梵语梵文的启示，将汉语分清四声，制定平仄格律，为此后的文章写作、古典诗词曲赋及联语的创作，提供了独具民族风味的路径。换个角度来说，这也是胡文化的高度“汉化”，它在六朝大分裂大动荡时局中强化了中华文化，特别难能可贵。

第三次波峰出现在隋唐之际，标志是长安和洛阳成为国际大都市，武威、扬州成为中外商货集散地；西域胡商遍天下，日韩来华的遣唐使、留学生络绎不绝。中国造纸术西传，经中亚西亚北非进入西南欧。此时，佛教中国化并走向民间，全面渗入到中国各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中。连佛经的诵唎方式、宣讲手法、佛陀故事，也启动了中国中古俗文学的兴起，使唐人的社会文化水平和社会认知能力获得了整体提升。世界各大宗教在中国土地上竞相发展，中国人的开放包容与欧洲中世纪的疯狂血腥镇压异教徒恰成对比。事情就是这般地奇妙：那么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因子，不但没有威胁到中华文化，反而强化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。事情的奇妙还在于：正是对异质文明的吸纳，增益了中华民族的光彩。

第四次波峰出现在宋元之际。其突出表现是：宋舶西航，直抵波斯湾，又通过阿拉伯商人影响到东地中海地区，让威尼斯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样的巨舶才可以穿洋过海。此时，东南沿海涌现一批对外通商口岸，天

及“中国潮”席卷欧洲。“中国潮”的作用力远及于两河流域、南洋、西洋，直至地中海周边与欧洲内陆。

这股“中国潮”从明中叶开始，直至清代康熙乾嘉时期也未曾衰竭，它让欧陆各家王室、广大士绅和普通居民，都躬承其惠。当时，中国的产业文明成果如丝绸瓷器家具建筑；制度文明成果如朝廷约束皇权、体现民意的谏官制度；行政文明成果如体现公开公平原则、竞争择优原则的科举制度；学术文明成果如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、老子的道生万物思想，与释、道的宗教哲学等，在欧洲思想界、学术界引发了巨大震撼。先进的西方思想家从中吸取了不少精神营养。仅仅东方“异教徒”高度发达的制度文明、社会文明的存在与被发现本身，就使处于中世纪黑暗而严酷的宗教统治下的欧洲人猛醒：在没有“上帝”的地方，同样有文明的理性光辉，而且更为灿烂！无可否认的事实激发着欧洲人对神学体系的深刻反思，欧洲人之所以能冲决中世纪宗教统治的严酷罗网，从漫漫长夜的黑暗中走出来，“中国潮”在其中起了巨大的冲击助推作用，发挥了吸引示范功能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在两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，东方文明在欧洲大陆一直是享有崇高声誉的。

截至清中叶的中外交往都是正面推进的，是和平、双赢、兼利、有序的，双方都没有相互报以殖民掠夺和炮舰威逼。虽有倭寇肆虐、海盗横行穿插于其间，但从未成为哪个国家的主流意志和国家行为。

有所思

周公旦的法治顶层设计

□ 韩 星

依据传统文献，周公旦最早提出了“明德慎罚”思想。周公总结商代圣王们的德政时说：“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，代夏作民主。慎厥丽，乃劝；厥民听，用劝；以至于帝乙，罔不明德慎罚，亦克用劝。”周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，给西周各诸侯树立了一个政治典范，这或许有拔高商汤的地方，但应该有基本事实依据。

从金文资料来看，“明德慎罚”在西周整个统治中是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。金文中凡载有“明德慎罚”的铭文，大都汇集在三个时期：成康、共懿和宣王时期，即历史上大乱之后的三个所谓治世、安定和中兴时期。这是符合一般历史规律的。一般而言，世乱多用刑，重刑重罚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导致大变；大变之后，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，重教化轻刑罚，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复苏。

周公在其命书中大量谈论教与罚的使用方法，阐述其“明德慎罚”的主张。周公的“明德慎罚”思想集中

体现在《尚书·周书·康诰》中。在《康诰》中，他对康叔说：“惟乃丕显考文王，克明德慎罚；不敢侮齔寡，庸庸，祗祗，威威，显民，用肇造我区夏……封，予惟不可不监，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。”此文是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封康叔于殷时对康叔的训诫之词。所谓“庸庸，祗祗”，是指任用那些该任用的人，尊敬那些该尊敬的人，这属于统治者修身明德的范畴；“威威”，是说惩罚那些该惩罚的人，属于“慎罚”内涵。周公在这篇告辞中，以文王为榜样告诫康叔一定要把“明德慎罚”作为自己处理政务时的指导思想 and 行动准则，去统治、分化、怀柔以至于刑事镇压殷遗民。周公同时指出，只有继承周文王的德行，王权才能保住。同时强调“明德”就在“慎罚”之中，“慎罚”体现了“明德”，“慎罚”就是“明德”的内容之一。“明德慎罚”即以“德”为本，以“罚”为补，是周公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实为西周政治文化的指导原则之一。

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引《尚书》

曰：“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惟曰其助上帝，宠之四方。”这里，君主的权力为天神所赐，而君主的义务则是治理人民（作之君）与教化人民（作之师），君主集政治与道德于一身。所以君主必定须“明德慎罚”“敬德保民”。文王为政，能够崇尚德政，慎用刑罚，不侮齔寡，用可用，敬可敬，刑可刑，以显示于民，最终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长久。君主作为神授其权的天子，应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，作道德上的表率，才能使人民效法，百姓安宁，国运恒久。这种政治理念正是古典儒学为政以德、德主刑辅思想的滥觞，先秦儒家的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的治道思想多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发挥。

如何将“明德慎罚”贯彻到治道中去？周初统治者提出的基本主张是：第一，在德的基础上罚与教统一。周公认为教化与刑罚的目的都是勉励人民立德，教化是道德教化，是以教化者首先须有“德”，因而《尚书》之“明德”首先强调君王之德。第二，先教后杀。周公认为在教与刑

并用的情况下，应当先以教化，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如经过教化仍犯，则为故犯，须以刑惩之。如在“群饮”即酗酒的问题上，周公认为，商人饮酒以至于丧国，周人应以此为戒，经过反复教育，而仍“群饮”者，则“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”。第三，义刑义杀。“慎罚”的核心是“义刑义杀”。《尚书·周书·康诰》曰：“汝陈时臬事罚。蔽殷彝，用其义刑义杀，勿庸以次汝封。”古代“义”、“宜”相通，“义刑义杀”就是“宜刑宜杀”，这是周人从殷纣王滥用酷刑、杀害无辜中吸取教训，告诫执政者不能随心所欲地滥用刑罚，要依据法典用刑。周公还主张要根据罪人的认罪态度，对刑罚的轻重进行调整。第四，因地制宜制定刑法。要根据不同诸侯国的历史文化特点采取不同量刑的刑法。据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记载，周公指示受封于殷故地的康叔和受封于奄国的长子伯禽，根据这些地区都曾殷商王朝中心的情况，要“启以商政，疆以周索”。这种根据社会治乱情况来决定量刑轻重的



周鼎

观点，对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“明德慎罚”是要求君主行政时正确地掌握赏罚大权。这种赏罚大权是夏殷王朝以及所有的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必要前提，但是从政治思想的高度，根据巩固政权的需要来研究如何正确地行使它们，是直到周人才开始有的。周人是以往事为借鉴，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才制定出来的。

“明德慎罚”思想的提出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。商朝末年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，残酷的统治激起广大人民的

反抗。据《尚书·微子》载，当时是“小民方兴，相为敌仇”。这种残暴统治必然激起众叛亲离，以致牧野之战，商军溃败，纣王自焚，商朝灭亡。西周王朝建立初期，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，认识到单靠天命天罚和重刑镇压不足以维护长治久安，必须对民众施行道德教化，给民众恩惠，并审慎地使用刑罚，才能争取民心，维持长久统治。

史 镜